

# 分配正义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向度

##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展开

郑鹏, 曹振

(海南大学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具有价值耦合关系, 即一方面, 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与行动遵循; 另一方面, 共同富裕是分配正义的实现基础。我国宪法法律上有关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的实证规则是二者关系的规范表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分配正义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效率优先向效率公平共同提倡的转变, 在内涵上实现了从单一正义到多层正义协同发展的转变, 在内容上实现了从物质分配到其他需求分配并重的转变, 在方式上实现了以税收为主到三次分配系统应用的转变。在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实现分配正义, 需要构建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以确保劳动基础可能, 对税收法律制度进行适应性改革以强化税收调控, 对弱势群体进行制度保障以实现社会关怀, 完善促进社会财富流动的第三次分配机制以建设慈善社会, 通过城乡融合和资源有序流动以促进农民权利保护, 以及优化府际合作框架推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 分配正义; 共同富裕; 社会正义; 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4)02-0017-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正义如何配置, 也即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正义”的容许度范围。从理论发展史来看, 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理论话题, 是国家和社会制度构建的前提性命题。可以说, 人类社会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分配正义的演进史。在概念上, 分配正义又被称为“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或者“经济正义”(Economic Justice), 是社会给予个人或者特定群体的“应得”待遇<sup>[1]</sup>。分配正义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 不同环境视野下生发出差异化需求及其制度安排。进入新时代, 我国已经全面消除绝对贫困, 但2021年基尼系数仍为0.442%<sup>[2]</sup>, 说明我国相对贫富差距亟待缓解。目前, 学界现有研究集中于共同富裕的理论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 涌现出一些高质量成果, 但关于分配正义与共同富裕关系问题鲜有讨论。有鉴于此, 本文通过对分配正义与共同富裕关系的辨析, 指出共同富裕背景下分配正义的时代意蕴及其实践方向, 为推动建立惠及最

**[收稿日期]** 2023-08-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世纪法国航行记录中我国南海维权证据整理与研究”(21VJXG006)。

**[作者简介]** 郑鹏(1989—), 男, 四川雅安人, 法学博士,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学、比较法。曹振(1995—), 男, 山东临沂人, 海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学、共同富裕。

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社会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 一、分配正义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关系

分配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深刻影响着社会制度的整体谋划与实践运用。随着近年来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张扬,实现社会分配正义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事项。理论视角来看,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具有价值耦合关系,即一方面,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与行动遵循;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分配正义的实现基础。而我国宪法法律上有关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的实证规则,则是二者关系的规范表达。

#### (一)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

关于分配正义理念的产生原因,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的著作当中就有所讨论。柏拉图认为“金钱和财物在公私生活中过量就会产生敌对和长期不和,而匮乏则一定导致奴役。”<sup>[3]</sup>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按照某种标准(如自由身份、德行、地位)成比例分配的,这种分配正义的基础是社会资源占有量的差异。卢梭更进一步地认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是它导致了分配不公的产生,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物权依附关系。“防止的方法,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而是用各种方法防止他们聚集财产;不是修建收容穷人的济贫院,而是保证公民不致沦为穷人。”<sup>[4]</sup>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劳动成果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导致了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现象。“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sup>[5]</sup>罗尔斯在上述论点基础上,主张依据“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解决社会基本结构正义的实现难题。也有论者对政府介入正义分配的行为持警惕态度。比如哈耶克认为,收入分配正义不仅缺乏正当性依据,而且会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后果,如社会特权、损害自由自立、疏于防范等。诺奇克持反对国家为了实现收入分配公正而参与再分配的行为,主张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即使为了社会更大的公共利益,也不得强制牺牲个人的较小权利<sup>[6]</sup>。总体上看,理论家们都将分配正义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取向,这种观点深刻影响着立法者和执法者的行为方向。

不过,分配正义是一个静态的学理概念,如果不将其与具体情势相结合,始终无法生动反映在政策、法治层面。由于生产依托于现实物质条件,分配正义的实践也即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就有了阶段性特征,其内涵和标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就文义而言,共同富裕不仅要在“共同”上下功夫,即追求正义普及的广度;还要实现“富裕”,提升正义水平的高度。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富裕、渐进富裕<sup>[7]</sup>。因此,共同富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描绘的美好蓝图,也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更是对分配正义的社会历史性表达。

#### (二)共同富裕是分配正义的实践基础

共同富裕思想并非全然政治经济学的实证范畴,或是对经济社会现象的纯粹性描述,还包括对社会生活规范性的建构<sup>[8]</sup>。分配正义作为学理概念,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其真正实现有赖于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性,即需要借助共同富裕工具实现具体化。换言之,共同富裕不仅作为分配正义的

制度表达(目的本身),还是分配正义的制度工具。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废除当然是个新社会形式转换的必要条件,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必须把重点放在‘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sup>[9]</sup>因此,要真正实现收入分配正义必须消除私有制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使生产资料在全体人民中的合理分配。“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sup>[10]</sup>进而协调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之功能。

在马克思看来,摆脱人与人之间奴役关系需要借助于按需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不论前苏联解体还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表明,现阶段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逐步提高收入水平,否则只会将社会主义打上“贫穷”的标签。由于分配正义的核心内容仍是亘古未变的社会物质财富,以私有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历了“相对保护——绝对保护——再相对保护”的扬弃过程,增加富人财产的社会义务成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论共识。因此,自由主义的消极面向仍是分配正义命题的逻辑前提,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必须找到宪法层面的“基础规范”,尤其是以税收工具限制富人财产取得与增值过程,有赖于严格的法律规定。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我国公有制的社会基础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不同,但都不排除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因而贫富差距并非以意识形态为观察标准。相较之下,公有制因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规范和私有财产权非绝对保护的制度安排,与西方私有财产权社会义务、政府干预力量强化的理论逻辑,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换言之,公有制本身就代表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较强的限制能力,因此应当在批判性思考西方分配正义财产权保护优先、财产权社会义务、政府强力介入限度以及税收、社会保障等各项经验基础上,讨论共同富裕背景之下我国分配正义所焕发出的时代内涵。

### (三)分配正义与共同富裕的“宪法规范”

实现分配正义,离不开对社会基本结构的确认与发展。从法治国要求来看,分配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宪法基础规范的统领,也需要宪法上基本权利、基本义务以及国家制度条款的规范保障。虽然我国宪法并未直接规定分配正义概念,但经由社会主义原则、平等主义以及共同富裕条款,为分配正义的国家实践奠定了规范基础。

首先,《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分配正义的原则遵循。早在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中,就已经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将富强作为国家奋斗目标。1954年《宪法》提出,要“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文本表述没有“分配正义”的语言表达,但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来看,八二宪法内在蕴含着促进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的意思表示,即“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一词在现行宪法文本的出现频次高达50次,仅在序言中就出现了23次,尤其是《宪法》第1条第1款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因而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并非内容空洞的修饰语,而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sup>[11]</sup>。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启示国家治理者,发展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才能实现所有人的富裕。因此,作为分配正义宪法外观之一的社会主义原则,其规范效力即为国家改革与发展目标的实质约束,意在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任

务后,逐步走向共产主义。

其次,《宪法》上平等权是分配正义的规范表达。分配正义的核心乃是平等与权利。“平等是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理想,而平等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sup>[12]</sup>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平等主义不同于西方形式平等的分配正义观,后者以自由权利保障为基点构建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形式化法治更容易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保护机制,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阻碍共同富裕的推进<sup>[13]</sup>。我国注重个人地位差异,通过重构经济基础、建立公有制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此外,由于分配正义的最终判断标准应是人,即“为谁分配”中的受惠主体<sup>[14]</sup>,我国进一步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并通过政府福利制度,对普遍个人以及弱势群体给予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关怀。因此,我国《宪法》上的平等主义分配观具有促进实质公平的优势。

最后,《宪法》上共同富裕条款是分配正义的实证外观。作为政治术语,“共同富裕”一词深刻体现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其目的在于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宪法》为实现共同富裕创设了大量的条款依据,成为分配正义的规范支撑。其一,《宪法》第六至十八条专门规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中,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规则,第二款规定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过渡时期,还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时,国家仍有存在的必要。”<sup>[15]</sup>“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国家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目的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sup>[16]</sup>由此,八二宪法允许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合法存在。其二,《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层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各类企业在实现社会财富增量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资本、土地、产权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财富分配,会导致分配差距越发明显,需要共同富裕规范对此予以不同关注。其三,《宪法》及《预算法》规定了国家的财政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大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福利给付职责,但又受制于宪法“有限政府”的基本价值倾向。据此,我国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快现代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尤其是大力推进税收法治建设,落实财政立宪与体制改革的统一性要求。其四,《宪法》还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富裕事业的条款。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条第2款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原则,明确了党的领导地位的合宪性,使党的组织成为国家权力机构。同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其一党执政的特点可以确保法律政策始终朝着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而积极行为。<sup>[17]</sup>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在短期内消除绝对贫困,并继续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 二、分配正义的时代意蕴

分配正义的社会历史性决定了要结合环境基础探讨分配正义的时代意蕴。以共同富裕为观察视角,分配正义在理念、内涵、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较之以往有所发展。

### (一)理念革新:从效率优先到效率公平共同提倡

公平与效率构成了分配正义的价值核心。罗尔斯就将公平建立在平等主义基础上,主张给予不同人不同关注;诺齐克则在自由层面讨论了公平的实现问题。而哈耶克将效率置于优先地位,认为过度强调公平将会侵蚀自由的根基。在我国,有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构成了政府行动的基本逻辑。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绝对平均的社会政

策,生产力总体上较为落后,普遍贫穷成为人民生活的基本状态,使得贫富差距被控制在极小范围内。随着时间转向八十年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被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效率成为国家发展的优先项,国家鼓励“先富带后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市场经济改革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大幅提升。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财富在全社会分配的不合理,基尼系数长年高位运行。因此,二十一世纪以来,公平与效率关系被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前者依赖于逐渐完善的市场机制,后者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介入。直到党的十七大,公平与效率关系被置于同等地位,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效率与公平同等重要性基础上,更加突出公平理念,不仅提出新发展理念,还实现了全面脱贫的历史目标,更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尤其是在“共同富裕”理念系统提出之后,公平成为党和国家未来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指引。

事实上,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本质上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中国官方文件有关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论述,是随着对市场体制认知的不断深化而变化的。在现阶段,强调效率对于实现公平具有基础性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财富量上确保公平的可能性。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市场经济在尊重个体自由和能力的同时,也会放大个体间社会地位、资源禀赋、知识才能的差距,进而造成社会资源垄断、财富垄断,固化阶层利益。不过,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在公平调节上具有一定制度优势,即通过较强的政府干预有效抑制或者消除市场经济负外部性,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因此,如何实现政府促进共同富裕与发挥市场规律、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是实现分配正义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 (二)内涵扩展:从单一正义到多层正义协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事实的不断演进,分配正义的内涵表述也逐渐丰富,这不仅符合人之尊严的基本需求,也符合社会情势的深刻变化。总体看,分配正义的内涵主要有如下发展趋势。

第一,从个体分配正义到群体分配正义。市场经济自由逐步扩展以来,个人不再受制于计划经济的高度控制,寻求自我的成长和发展成为每个人的独立价值。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最终使一部分先进主体获取了大量财富积累。“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个人是具体的存在,每个个人都拥有追求富裕的权利,每个个体追求富裕的努力,才能汇聚成为共同富裕的时代潮流,促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sup>[18]</sup>然而,这导致社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从而产生不利于某些群体人权保障的连锁反应,引发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比如,残疾人社会保障、少数民族发展权利、妇女儿童权益、老年人数字权益等。这些弱势群体具有某些方面的集体利益诉求。从国家立法理念来看,立法者从聚焦于个体间分配正义的税收法律调节制度,到出台诸多关涉特定群体的法律,逐步强化了特殊群体法律保障力度。不过,由于这些法律规范仍处于起步阶段,仍然面临着规定事项有限、效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第二,从城市分配正义到城乡分配正义。新中国成立之后,农业被置于为重工业提供资金的基础地位,农村农民也为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但由于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基本上不属于社会资源分配对象,且农民长期承担较重税负,整体处于贫困状

态。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城乡流动障碍的解除致使大量农村青壮年的涌入,实现农村闲置劳动力向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自1978年至2020年,我国城乡收入增长差距不断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依旧较大。因此,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加强农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成为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分配正义开始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首先实现了消除贫困的历史性任务,但仍面临着城乡社会保障标准不统一、农民基本养老金与城市职工养老金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乡村科技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力量差距极大等现实问题。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农民,几千年来一直将农业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共享发展成果是分配正义的应有内涵。

第三,从地区分配正义到区域分配正义。传统分配正义观点多在宏观层面讨论分配正义路径,未能从地区视角出发观察不同地区的诉求。事实上,分配空间正义是空间资本的扩张需要,又是空间生产与分配现实驱动的必然结果。对政治、权力以及资本的拥有量决定了空间资源能力,进而引发空间资源分配的不正义,形成恶性循环<sup>[19]</sup>。目前,我国面临着区域发展极端不平等、区域绝对差距不断扩大问题,这最初与建国后工商业布局思路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后,各地地理位置、经济区位、资源禀赋以及政策指引的现实因素,共同加大了东部沿海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直接导致全国性的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升级。随着近年来区域合作更加紧密,产业优势进一步互补,分配正义从单一地区内资源配置转变为区域间资源合理分配,不仅包括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协调关系,还包括发达地区之间、落后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国,强调区域分配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体现了共建共享的发展观,因此需要更为精准的区域政策与制度安排。

### (三)内容丰富:从物质分配到其他需求分配并重

物质资源作为个人发展之根本,一直受到政治学者的重点关注,是分配正义的研究重点。不过,社会经济发展帮助大多数人通过劳动实现了收入财富的增长,从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仅有少数人将食物、金钱作为主要生活目标。从人的需求演化逻辑来看,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民群众有着多样且广泛的需求<sup>[20]</sup>。总体看,分配正义由纯粹物质追求,逐渐增添精神追求与政治追求,并在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以及环境改善方面提出新命题,这不仅是单一地区资源改善与资源配置理念的更新,更涉及城乡、区域之间资源调配的现实要求。分配正义具有社会历史性,其内涵丰富过程即是人权保障水平逐渐提高、又对人权保障标准提出新要求的上升进程,但根本上仍是将物质分配作为基础,进而满足由此生发的其他正义需求。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sup>[21]</sup>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中央就已确立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进行、共同发展”的战略部署;十六大又将“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纲领之一;十七大又将“社会文明”作为现代化目标,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到十八大,“生态文明”作为第五个布局,与前面四个文明共同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个方面,扩充、丰富了分配正义的内涵,促使分配正义的重点转向精神正义、社会正义、民主正义以及环境正义等方面,进而促进人民的自我发展。目前,我国依据五位一体的正义布局,推动中国各项改革改革事业稳步向前。

### (四)方式补充:从税收为主到三次分配系统应用

传统分配正义的关注点集中在物质分配上,致使理论观点和国家决策主要通过税收政策和社

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财富格局进行调整,税收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主渠道。从世界经验来看,税收调节收入主要依靠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并基本上都使用了累进税率模式。由于财产权保护理论对国家征税权的实体限制,“税负应按个人受到国家多大程度的保护或从国家那里得到多大利益的比例来进行分配。”<sup>[22]</sup>但不同收入水平的纳税人对税收敏感性不一,高收入群体收入更多且资源消耗量更大,却并未承担相应更多纳税义务,这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承担错位。因此,国家需要借助社会保障制度,满足弱势公民在医疗、养老、教育、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需求,演化出“福利国家”形态。同时,一些国家依托完整的直接税体系建立了慈善捐赠体系,通过慈善组织、个人捐赠资格认定与纳税减免等措施,吸引个人和企业参与到社会分配之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弱势群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程度。

随着我国对分配正义从效率追求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更为积极且全面的调整手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作为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分配正义的制度安排。具体来说,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sup>[23]</sup>。

相较于域外经验,我国将第三次分配作为独立制度体系予以张扬,这是基于我国慈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作出的选择,区别于域外的慈善捐赠。总体来看,三次分配是协调互动的体系概念,初次分配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再次分配以税收调节,但市场外部性无法依靠自身克服,只能借助政府等外部力量予以调整。因此,再分配主要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实现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和重点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优先性,再分配是次要的、辅助性角色。从而,市场机制外部性可以通过高标准道德之弘扬,吸引公民自愿参与财富、服务分配,以自治性的社会机制补充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足。同时,有利于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缓解社会个体焦虑情绪并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sup>[24]</sup>。但我国 2021 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值为 4466 亿元<sup>[25]</sup>,而慈善捐赠金额仅为 2253.13 亿元,占全国 GDP 总量的 0.21%<sup>[26]</sup>,这也意味着我国第三次分配事业的发展空间广阔。

### 三、共同富裕背景下分配正义的实践向度

#### (一)劳动基础:构建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

分配制度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基础,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分配制度设置的根本目的,分配原则则是社会制度在分配领域的价值导向<sup>[27]</sup>。在初次分配中,通过劳动要素获得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消除剥削的社会基础,但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收益权,防止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达成垄断之实,并采取限制公民获取财富的非正当方式。从而,要在初次分配中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保障个人和企业等主体的产权保护和经济自由。

一方面,依法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权。经济自由权其实就是对市场主体的营利动机、意志及其行为的客观化应当受到国家的尊重与保护,并排除公权力恣意侵犯的一种能力或资格<sup>[28]</sup>。从宪法文本看,其作为宣示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最高规范,直接规定了劳动自由和营业自由等经济自由内容。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对于公民经济自由的保障力度应当进一步强化,要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分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放水养鱼”的作用。

另一方面,依法保障经济主体的产权。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个人财产权为公民自由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没有财产权,就不会有市场,不会有法治<sup>[29]</sup>。产权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实现扩大再生产和市场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被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之中。但是,民营经济往往受到行政权力之侵犯,致使民营企业及其经营性产权保护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强化对民营经济主体的立法保护,一方面要加强高质量法律供给,逐步推进涉及民营经济的物权法、公司法、税收等法律规范的立、改、废工作,清理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另一方面,要完善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控制机制,促进政府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慎重处理涉企民事纠纷,对于应当立案调查的案件及时立案处理,不得越权管辖、违规立案、滥用刑事侦查手段侵害民营企业财产等,建设有限政府。

### (二)税收调控:税收法律制度的适应性改革

随着福利行政的发展催生财产权利限制的宪法要求,税收法律制度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规则。“在个人张扬其财产自由的同时,应使其财产亦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也就是能够促进合乎人类尊严的人类整体生存的实现。”<sup>[30]</sup>新时代,以高质量税收法律制度引领分配正义,需要在如下方面展开。其一,类型化设定纳税义务。促进共同富裕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其二,完善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构造。我国直接税体系存在结构不合理、不完备的“质”的问题,以及总量不足的“量”的问题,未来应当继续完善所得税税制、新设遗产税征收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以及强化资本利得税征收等,充分发挥直接税的优势功能。<sup>[31]</sup>其三,推进累进税率的适用。国家要坚持量能课税原则,重视制定纳税主体收入绝对值、主体类型、特定行为以及边际税率效用等具体情况而为综合性征税方案,确保纳税人的实际税负水平要遵循最高不超过所得半数原则。

### (三)社会关怀:强化对弱势群体制度的保障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仍然要重视还有相当一部人处于低收入水平,而且还有相当一部人弱势群体无法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资料。“社会保障不仅与国家现代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也与社会平等呈正相关关系。”<sup>[32]</sup>事实上,对少数人的制度关怀是宪法确立的基本义务,即第14条第3、4款规定了国家社会保障义务,包括直接性的社会福利提供义务,以及间接性的教育、文化等促进机会公正的支持机制(第19、20、21、22条)。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程度。有必要在中国倡导以渐进方式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以减少社会不平等”。<sup>[33]</sup>其一,要提升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经费支撑。“所谓现代法治国家成为社会国家,主要系以租税国家之形态表现其功能。”<sup>[34]</sup>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出现短缺问题,国家通过国有资本划转、提高缴纳比例、限制资金用途等方式实现存量的合理利用与增量渠道的扩大,但未来应当通过提高地方财政汲取能力、打破社保区域壁垒、加强转移支付等措施,确保社保制度的稳定运行。其二,要针对不同弱势群体强化支持力度。比如,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未来应当以老年人权益保障为中心,构建医疗、卫生、康复、丧葬一体化制度措施;对残疾人的保护不单要从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入手,还要在教育、出行、科技等软设施层面强化非歧视水平;对于婴幼儿等未成年人的保护应当朝着社会化抚养进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依据事权划分承担相应的资金保障与制度运行职责;等等。其三,还要完善社会救济体系,对社会救助体系进行组织调适以增强救助水平,通过开展免费教育、免费培训等日常性救助措施提高救助对象自我



发展的能力。

#### (四)慈善捐赠:以第三次分配促进财富流动

作为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性制度,第三次分配是一种社会财富的道德调节模式。第三次分配的内在动因是基于强者同情、怜悯这种自我实现的人性特质,通过捐赠金钱、提供服务等方式帮扶弱者。因此,第三次分配不仅是普惠性的,还是特定性的,是社会优势主体向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过程。由于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基本上是市场主体,因此第三次分配更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予以实现,可以说,虽然第三次分配位居再分配之后,但第三次分配和初次分配一样,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结果,而再分配则是政府介入的产物。因此,第三次分配具有社会性、自愿性、有偿性、辅助性等基本特征<sup>[35]</sup>。为此,需要在物质激励上通过提高慈善捐赠抵扣标准、扩大慈善捐赠抵扣主体范围等方式强化第三次分配的税收优惠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教育、科技、文化、弱势群体保护等领域;在精神性激励上,需要政府提供道德表彰这类公共产品,建立定期奖励机制,设置多样化的奖励项目。此外,需要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事业的治理,发挥市场主体的自治水平。某种意义上,市场外部性可以借助于自身力量予以解决,而这种力量即为社会公权力的行使者——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发挥政府职能、解决社会纠纷的作用。目前,我国还未建立第三次分配的行业自律组织,未来可以通过对现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捐赠组织、志愿者组织等进行权力改造,增强第三次分配的治理效能。

#### (五)城乡融合:促进资源流通与农民权利保护

城乡发展差距的形成不仅具有政策、制度原因,还具有市场用脚投票的“自然选择”因素。目前,城乡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居民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两类,前者受制于国家对于农业农村政策约束及其衍生的财产权能有限等原因,后者则受政府财政能力差异与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能力。总体看,城乡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逐渐拉大的。当然,由于国家近年来对三农的重视,大部分农村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上满足了最低需求,但质量上仍与城镇差异较大。同时,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非粮化”这类高附加值的生产方式开始受到限制,农村发展有向传统生产方式回归的趋势,会拉大耕地较多地区农民的实际收入。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总体上需要遵循如下思路:一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扩大农民的土地权利,允许农民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这类民事权利获取土地增值收益。二是打破城乡协同发展的制度障碍,建立土地权利交易市场,增强农村土地投融资功能,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逆向”流动,以此满足农村产业发展需求。三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医疗卫生、义务教育、体育设施等硬件、软件建设,促进农民生产生活便利化,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四是加强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乡村自治和法治乡村建设。

#### (六)区域协同:府际合作框架下的利益补偿

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城乡流动障碍的解除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资源更加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区域中心城市、大城市,加剧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现象。为此,我国先后实行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但区域发展没有有效弥补反而更加扩大。党中央提出,“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sup>[36]</sup>治理区域发展失衡实际上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如果仅以地方自主性为主导,将会在强化本区域产业互补和融合发展基础上,放大对

落后地区的“虹吸效应”,造成国家财政投入以企业利润方式转移至发达地区的新问题。事实上,区域协同发展不仅意味着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意味着区域乃至全国产业链的优化升级,对于经济发展有积极益处。首先,应当强化区域战略统筹机制的设立。2023年修改的《立法法》就将“地方协同立法”作为法律制度予以确立,为地方区域协同发展奠定法律规范支撑。地方应当在既有实践基础上,发展出适合本区域合作框架和需求的协作模式。其次,要在整合地方市场、资源基础上,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阻碍市场要素的地区自由流动障碍,降低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再次,要加强区域互助机制建设,以行政力量推动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帮助实践,但要通过府际关系或者央地关系立法方式,确保区域互助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最后,要建立法治化的横向转移支付机制,通过教育培训、产业转移、治理协议等方式对弱势地区进行利益补偿,实现共同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M]. 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17.
- [2]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202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18.
- [3] 柏拉图. 法律篇[M]. 张智仁,何勤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37.
- [4] 卢梭. 政治经济学[M]. 李平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6.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3.
- [6] 罗伯特·诺奇克. 无政府主义、国家与乌托邦[M]. 姚大志,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5—36.
- [7] 燕连福,王亚丽.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基本遵循与发展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1):1—9.
- [8] 魏传光. 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正义观[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03):1—9.
- [9] 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 郭忠华,潘华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24.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7.
- [11] 张翔. “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06):19—30.
- [12] 姚大志. 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J]. 哲学研究,2023(02):119—127+129.
- [13] 邵六益.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法逻辑[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2(05):13—24.
- [14] 史瑞杰. 从古代分配正义到现代分配正义——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演进理路及其启示[J]. 新视野,2016(03):5—12.
- [15] 李忠夏.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定位:“合理利用”的规范内涵[J]. 中国法学,2020(01):86—105.
- [16] 肖泽晟. 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J]. 法学,2014(05):28—34.
- [17] 曹振. 税收促进共同富裕的规范逻辑及实践进路[J]. 南海法学,2022(06):102—112.
- [18] 王德志,王必行. 共同富裕的权利逻辑:结构、演进与实现路径[J]. 人权,2023(03):50—72.
- [19] 袁超. 空间正义何以可能?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05):165—170.
- [20] 杨文圣,张玥.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四维审思[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4):1—9.
- [21] 刘俊显,张崇旺. 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当代实践[J]. 学术探索,2023,(04):17—23.
- [22] 金子宏. 日本税法[M]. 战宪斌,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64.
- [23]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 奋斗,2023(16):4—9.

- [24]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浙江社会科学,2021(09):76-83+157-158.
- [25]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发布 慈善资源总量持续增加[N].公益时报,2022-11-01(13).
- [26] 《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精简版)[EB/OL].(2021-11-26)[2023-09-15].<http://www.charityalliance.org.cn/news/14364.jhtml>.
- [27] 王鑫.分配正义在社会主义中国:基于分配制度的考察[J].学海,2022(02):13-21.
- [28] 冉富强.国家举债权与宪法基本权利之关系——以经济自由权为中心[J].河北法学,2010,(03):56-61.
- [29] 范进学.“共同富裕”的宪法表达:自由平等共享与法治[J].交大法学,2022(06):40-57.
- [30] 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J].中国社会科学,2012,(09):100-119+207-208.
- [31] 曹振.论我国直接税体系构造的缺漏与补正[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04):8-17.
- [32] 郑功成.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新制度文明[J].社会保障评论,2023,(01):3-21.
- [33] 于晓华,钟晓萍.全球化、智能化与不平等:走向共同富裕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探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01):23-36.
- [34] 葛克昌.租税国的危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53.
- [35] 曹振.共同富裕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运行逻辑与制度展开[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06):32-43.
- [3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J].中国民政,2020(21):8-21.

(责任编辑:闫卫平)

##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Wealth

ZHENG Peng, CAO Zhen

(College of Law,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28)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have a value-coupled relationship; i. e., on one h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the value kerne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action to follow; on the other h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empirical rules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laws are the norm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the new era, distributive justice has realized a change in concept from prioritizing efficiency to jointly advocating efficiency and equity, a change in connotation from single justice to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multilayered justice, a change in content from material distribu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other needs, and a change in mode from tax-based to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distributions. To realize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common wealth,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arket economic environment ruled by law to ensure a labor base, to carry out adaptive reforms of the tax system to strengthen tax regulation,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provide social care, to improve the thir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flow of social wealth to build a charitable society,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asan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orderly flow of resources, and to optimize the framework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common wealth; distributive justice; social justice; socialism